



老兵话当年

第四辑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编



老兵当年

第四辑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2003.9

封面设计：吴 捷

版式设计：张金昌

老兵话当年

第4辑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准印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创新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237 千字

2003 年 9 月 印数 3000 册

准印证号：苏出准印(2003)JSE-0000419

《老兵话当年》编委会

主任 储江

副主任 郑竹波 黄玉生

委员 顾静 朱泽 吴镇

荀毅抗 陈辉 缪国亮

束颖 王正方 征

张衡 肖茂修

主编 刘顺发

副主编 华晓琦



目 录

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参加新四军拾录	林 革(1)
忆阮英平同志	孙克骥(12)
“民先队”战斗在敌后	后文洙(21)
史沫特莱到敌后访问新四军	后文洙(23)
不受压迫要革命	黄少武(24)
当新四军去	韩 风(27)
郑妈妈救我脱虎口	何赋亭(36)
往事如烟更如潮	王建东(39)
回忆老一团在黄桥决战中的片断	王同一(42)
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盐务工作	王建东(44)
出版发行工作在江北的成就	吴 铭(54)
陈毅派我送信	汤 瑞(57)
人民的好师长	郑翼云(58)
回忆汤园地区的抗日反清乡斗争	陈惠文(61)
盐城军部行	吴 铭(73)
回忆五旅渡洪泽湖	吴敬民(78)
粟裕司令安排的海上会议	汤 瑞(83)
奇异的遭遇战	王在选(85)

成功的战略决策	朱建群(87)
保卫根据地,发行自己的货币	葛 钧(92)
二师铁锤子团的由来	戴寿春(97)
聆听刘少奇同志的报告	秦 明(103)
遭日军突袭的盛圩子战斗	王在选(105)
难忘一九四一年	汤 瑞(107)
难忘的“战斗”	汪 明(110)
在战火中成长的地方武装	程庆和(112)
军民鱼水情意深	谭金保(117)
与李进同志在靖江战斗的日子	莫 珊(119)
难忘军民鱼水情	汪 明(123)
靠群众掩护脱险	吴竹心(125)
忆二旅南下	吴子昆(128)
白马将军彭雄	秦 明(130)
六十三年前的一次违纪	陈仲斌(132)
心香一瓣怀李进	张渤如(135)
回忆一师二旅南下	储孔玉(140)
化险为夷一幕	韩际云(145)
一次沉痛的战斗	韩际云(147)
彭雄、田守尧烈士英名永存	韩培信(149)
将星陨落 光照九州	陈学文(155)
苏南反清乡斗争	储孔玉 吴子昆(160)
反封锁是反清乡斗争的中心环节	储孔玉(163)
忆茅山反清乡期间三件事	张馥赓(167)

王必成是司令又是政委	孙海云(171)
我是三支队六团的一个兵	周荣发(186)
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记	左如桂(188)
到八滩军械所领枪	王 克(190)
素不相识的敌工战友滕小良	朱 泽(192)
难忘的战地医校	汪 敏(194)
抗大九分校文化教育片断回忆	张效琳(198)
小印章保护住新四军的生命粮	王良佑(206)
活捉日本宪兵队探长王其道	李普凡(208)
力保华中金库	徐立宇(212)
战斗岁月中的革命情谊	李 运(217)
一月津帖	李泽林(220)
沙序凯与“保健堂”的创建和发展	赵 生(221)
青纱帐里许布洛妙设伏击战	周远谋(228)
“天下无敌”锦旗的由来	陈以和(231)
长江护航大队二三事	孟秉诚(234)
难忘尖山反扫荡战斗	蔡博文(236)
忆演《国母骂蒋》短剧	蔡博文(239)
缅怀李进同志	许映光(242)
给敌人演出革命戏	王良佑(245)
往事忆联中 启迪后来人	赵飞云(248)
苏南新四军北撤前后	张 超(253)
一项特殊的任务	李 运(258)
一次有意义的慰问演出	石 坚(260)

话说娃娃京剧团	陈仲斌(262)
苏中一分区的抗大式干部学校	郭群生(265)
一天伙食	李泽林(269)
参加日军中队投降谈判的回忆	高增诚(271)
深切怀念老首长粟裕同志	荀毅抗(273)
华中宣传教育大会侧记	苏挺(278)
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	李志成(286)
用生命养护两干部的沙和庆	于进(289)
难以忘却的往事	吴芸芳(292)
许方凡痛失三亲人	于长富(295)
不尽的思念 学习的楷模	王建东(297)
穿血衣的精神	朱新星(301)
在炮兵第一次参加战斗——打济南	石坚(303)
难忘的两次渡海突围北撤	王泽群 冯达(308)
一支边区武宣队	韩际云(314)
回忆渔沟击落一架敌机	孟秉诚(316)
悲哀的马坚同志	海笑(318)
两元津贴费的来历:税收	李剑锋(321)
在叶挺休养所打埋伏的日子里	李达春(323)
忆茆庭恩同志诱敌保军粮	林必兰(327)
一条在敌人眼皮下的通道	何平(329)
启东英雄郭正桥	郭胜(333)
参加华野特纵成立大会	石坚(336)
二联防突遭敌人袭击	于长富(339)

医疗转运队遇险	蔡博文(341)
陶司令指挥我们渡河	韩 风(344)
在摔伤膀子的日子里	李泽林(347)
难忘的“百家饭”	李泽林(349)
对国民党军23师起义工作的回忆	梁希雄(350)
忆谭老二三事	汤 瑞(368)
雪地宿营	张 华(370)
战火中的“半边天”	王良佑(372)
坚持发扬一往无前精神	姚 鼎(376)
难忘杨勋同志	海 笑(378)
长留心底一支歌:《寄母亲》	程光华(380)
怀念谭义连	李剑锋(385)
难以忘怀三件事	蔡博文(387)
初进总统府	李剑锋(390)
在朝鲜《停战协定》生效的日子里	于 进(393)
忆与粟裕司令员相处在牡丹江	余景行(397)
痛哭将军作家陈靖	海 笑(403)
从涟东独立团到农四师十团	朱建群(406)
忆上房街血债	于长富(409)

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 参加新四军拾录

林革口述 尤亮记录整理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逾耄耋的我,许多往事已记忆淡薄,但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的卢沟桥事变,当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旅居菲律宾的华侨青年,在各界侨胞的全力支持下,热血沸腾,同仇敌忾,组成“菲律宾华侨回国抗日义勇队”,请缨回国参加新四军,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壮举,却镌刻铭心,有似昨天。

—

我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县蛤蚶镇莲埭村西堡角。6岁时,父亲亡故。14岁时,迫于家境由在菲律宾的三舅、四舅资助,买了一张护照,跟随舅舅到菲律宾马尼拉郊区的一家杂货店先当帮工,后当正式店员谋生。月工资从10元15元升到20元、30元,当时汇一元钱到晋江,可以买到一担大米。这样我既能自食其力,也能赡养在晋江的母亲。抗日战争的掀起,破碎了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人生,

决定了我的一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菲律宾报刊不时刊登有关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消息，也不断有国土被日寇侵占的报道，一些不明事理真相的菲律宾人，还讽刺挖苦、取笑我们中国人。有的举着大小姆指说：“你们，大大的中国，打不过小小日本。”这真使我们华侨青年有刀割斧劈切肤之痛，倍感羞愧耻辱难忍。总想找到机会，把满腔怒火喷向日本侵略者。就在此时，在菲华侨于1934年响应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人针对九一八事变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呼吁而成立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于1937年冬，决定组织部分华侨青年回国，用直接行动参加神圣的抗日救国事业。我从报刊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激动万分，当即下决心应召，为报国雪耻贡献一份力量。

193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瞒着舅舅离开谋生的店铺，到“民武分会”报了名，受到分会负责人之一沈尔七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安排。我住下后发现，已有几十人先我而至。“民武分会”安排的住处设有阅览室，备有当地和巴黎等地出版的一些报刊，有《中国近代史》、艾思奇的哲学著作，还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有关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方面书刊。这对于一个对时局知之甚少、思想极其单纯的我来讲，真似一股甘泉润心田。我们这些应征的青年人，基于朴素的爱国、爱民族、爱家乡父老的游子之情，每每

谈及日寇侵华，决心回国效力，总是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恨不得立即返回祖国，奔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线。

一个星期后，“民武分会”把我和近70名青年组织起来集中学习。由沈尔七同志向我们介绍国内抗战形势，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计划回国后加入抗战队伍以及回国前的有关准备工作等。经过一个多月学习和思想、组织准备，“民武分会”决定在参加集训的人中挑选了近30人组成“菲律宾华侨回国抗日义勇队”(简称“义勇队”)先期回国，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义勇队”由戴旭民任队长，余志坚任副队长，郑映明任政治宣传员，沈尔七以“民武分会”代表的身份任总领队。记得队员中有余志坚(又名蔡建华)、李俊民等粤籍青年6人，沈尔七、郑映明(又名郑显玉)、戴血民(又名戴旭民，系旅菲国民党元老戴金华之孙)、杨血映、陈扬德、王天华、林振声、陈祖亨、庄忠忠、孙仲英(又名孙平)、李铁民和我等闽籍青年22人。队员年龄都在20岁上下，最小的陈扬德(离休后落居北崮山江苏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当年只有16岁。

1938年1月18日，“义勇队”肩负着在菲华侨拯救中华、抗日救国的重任，告别朝夕相处的父老兄妹、亲朋挚友，乘坐“江苏”号轮船启程离菲。行前在菲各侨团、广大爱国侨胞为我们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菲律宾的报纸纷纷报道了“义勇队”回国抗战的新闻，“义勇队”也发表了庄严的回国抗战《宣言》，表达了海外赤子爱国抗日的赤诚丹心。

二

1938年1月20日，“义勇队”经过三天两夜的航行，绕过已被日寇占领的金门岛，踏上了祖国的东大门福建省厦门市，受到了厦门人民和厦门抗日组织的欢迎。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形成不久，国民党厦门当局也不得不作出姿态对“义勇队”表示欢迎。正当“义勇队”同志为即将奔赴抗日前线而兴奋不已，准备按原定计划开赴福建莆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中游击队汇合时，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层层阻碍和破坏、瓦解。当时，驻莆田、泉州的国民党军第239旅，正在策划袭击我闽中游击队，驻厦门的国民党军第157师则提出将“义勇队”编入其“壮丁队”参加军训，并许以“训毕每人给排长以上的军官官衔”作诱饵。这显然是欲收编“义勇队”，将“义勇队”纳入其“先安内后攘外”消极抗日的道路上去。国民党极为险恶的这一招，理所当然地被“义勇队”所坚决拒绝。国民党收编“义勇队”的花招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对“义勇队”多方刁难，无理要求“义勇队”每人交出两张相片，办理所谓在厦门的“集体护照”，把“义勇队”所有队员的相片贴在一张“集体护照”上，以此来限制“义勇队”的行动自由，消磨“义勇队”队员的斗志，动摇“义勇队”队员抗日报国的决心。

正当“义勇队”处于抗日无路、报国无门的困境时，我

们获悉，坚持于闽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已奉命组成新四军第二支队，正准备开赴大江南北抗击日寇。这一消息给“义勇队”以极大的振奋与鼓舞，于是，“义勇队”决定移师闽西，加入新四军。为了能顺利地奔赴闽西，我们一面积极准备，一面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周旋。为了转移国民党当局对“义勇队”的视线，摆脱国民党当局“收编”企图与无理阻挠，我们把“义勇队”更名为“菲律宾华侨义勇队回乡工作团”(简称“工作团”)，提出深入闽南故乡，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工作团”专门为此发表了《告祖国各界同胞书》，热切表示：我们在奔赴前线与日寇直接血战以前，先回到故乡，介绍菲律宾侨胞的抗日救国活动，鼓励同胞们团结起来，保国保家乡。与此同时，我们“工作团”不断与国民党厦门当局交涉，广泛拜访有关群众团体、新闻单位，我们还举行茶话会，向各界人士阐明侨胞回国抗战的强烈愿望。可恨的是，国民党厦门当局对“工作团”下乡宣传的要求也不予核准，不签发通行证，以致“工作团”继续羁留厦门。此时“工作团”的经费业已告罄，为了维持生计，队员们纷纷变卖随身携带的行李，抽烟的戒烟省钱，甚至连队部仅有的两把小提琴也变卖了。就这样，我们在厦门高举爱国抗日旗帜，队员们四五人一组，深入街头巷尾宣传抗日，宣传爱国一家，宣传侨胞回国抗日的强烈愿望，给厦门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2月5日，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厦门地下组织及

厦门抗日团体的支持帮助下，终于冲破重重阻拦，包乘一辆大巴车离开了厦门，直奔闽西红军游击队活动地区——龙岩县境内，2月6日午后，我们到达新四军第二支队集结地龙岩县白土镇。

三

当我们到达白土镇的时候，正是新四军第二支队陆续集中于此，准备开赴江南敌后抗日之时。新四军第二支队获悉“菲律宾华侨义勇队”来龙岩从军的消息后，司令员张鼎丞等领导同志派出支队司令部副官处主任俞炳辉同志负责接待并带领“义勇队”。尔后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大会。正在龙岩的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和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十分热情地和大家见面，高度赞扬侨胞青年的爱国精神。张鼎丞司令员正式宣布接纳“义勇队”加入新四军，并称“义勇队”是第一支爱国华侨青年参加新四军的团体。从此实现了“义勇队”每个成员抗日救国的心愿，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义勇队”全体加入新四军后，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第二支队决定将“义勇队”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简称“随军团”)，召开了团员大会，举行了庄重的授旗仪式。由支队政治部任命沈尔七同志为团长，戴血民同志为副团长，俞炳辉同志为教导员，许振文同志为秘

书。与此同时，二支队党委决定，沈尔七、郑映明、杨血映、林振声等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由俞炳辉同志任支部书记。这就从组织上确立和加强了党对这支华侨抗日队伍的领导。

我们这伙华侨青年，虽都抱有抗日救国的热情，但从海外回到国内，从普通老百姓到革命军人，毕竟需要一个适应、转变的过程。二支队领导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非常重视对我们的教育培养。组织我们参加军事训练，进行人民军队革命传统教育，安排我们参观连队，听取部队战斗历史和先进模范事迹介绍。邓子恢、张鼎丞等首长还亲自给我们讲课，谈抗日斗争形势，讲解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赞扬我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号召我们付诸于实际行动。所有这些，使我们深受启迪和鼓舞。

“随军团”在进行军政训练之余，多次在龙岩县城进行宣传抗日活动。有一天，三架日机突袭龙岩上空实施轰炸、扫射，“随军团”的同志们在帮助引导群众疏散的同时抓住时机进行抗日宣传，扩大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与考验。1938年2月下旬，新四军二支队奉命北上集中，2月27日，二支队在龙岩县白土镇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支队首长做政治动员，沈尔七同志代表“随军团”在大会上表了决心。会后“随军团”的同志们脱下西装革履，换上衣料不一，也不合身的新四军军装，热切地等待着庄严的出征时刻的到来。

四

1938年3月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率领下，离开白土镇，踏上了北上集中、深入敌后的征程。“随军团”奉命在沿途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写标语、发传单、演活报剧，向乡亲们揭露日寇侵华的暴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海外侨胞回国抗日的亲身经历。“随军团”的这些工作，博得了广大群众的称颂，沿途有些青年在“随军团”爱国热忱的感召下，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二支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从闽西经江西、浙江，于4月中旬抵达集中地皖南岩寺。此后不久，二支队领导决定把“随军团”交给新四军军部。记得是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李子芳部长亲自来接收的。“随军团”划归军部后，叶挺军长举行茶话会欢迎我们，他在会上宣布军部领导决定将“随军团”编入军部教导营，勉励我们抓紧军政学习，抗日杀敌，为国立功。当时，教导营已有3个连，学员都是从新四军各支队挑选来的红军连排干部，“随军团”先是编成一个排，由沈尔七同志任排长，不久又与相继从海外各地回国参加新四军的侨胞青年合编在一个连，称第4连。

1938年8月，以军部教导营为基础，扩编为新四军教导总队，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